

寻找肖塞

追记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第二任校长肖塞

苑桂贤

72年前，他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蹂躏，并经历了残酷解放战争的四平城，正是百废待兴。这时，一个年轻女子，默默地站在四平中学门口，回望她带领师生们亲手重建起来的校园，依惜挥手作别，而后奔赴省城，开启了她新的征程。

这一别，就是半个多世纪，她再也没有回来过，但四平人民却不会忘记她，不会忘记她曾为四平教育播下的红色基因，不会忘记她曾为四平中学搬下生生不息的智慧火种。她就是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早期的奠基人之一，四平解放后第二任校长、书记肖塞。

经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四平第一高级中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日新月异校园早已不见当年那破败的痕迹，但在庄严肃静的校史馆里，一张张黑白老照片却真实的向后来人讲述着历史的一幕幕。这其中就有一张肖塞的肖像照，这也是肖塞留给四平的唯一一张照片，虽然时间久远，照片已有些模糊，但依然能看得出肖塞校长的睿智、干练与慈祥。

我“寻找肖塞”的脚步就从这里开始……

“由于时间太久，加上当时四平刚刚解放，后来学校又几次更名换址，所以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资料。”陪同我一起参观的四平第一高级中学副书记白嫩不无遗憾的对我说。

是啊，如今辉煌闪耀的四平第一高级中学，在建校之初，却经历了艰难起步和数次变迁。据有关资料介绍，1948年4月，四平解放后，合并了当时的四平中学、四平女子中学、四平晓东中学(台湾卫道中学的前身)和四平师范学校，成立了河北省立第十中学。校址在四平中学。当时有初中10个班，高中5个班，学

生1100余人，教职工36人，是当时辽北省唯一的一所规模最大的完全中学。1949年3月，学校改称辽北省立四平中学。1949年9月，辽北省立四平中学更名为辽宁省立四平中学。直至1954年4月，四平市高级中学更名为四平第一高级中学。

那么，在这漫长的变迁道路上，就没有留下肖塞，这唯一一位中帼校长的足印吗？我不甘心的在诺大的校史室里来回寻找着，每一本书籍、每一段文字、每一张照片，哪怕只是一页纸张我都不肯放过，最后，我把目光定格在学校元老姚武越老师手写的六本回忆录上。

征得校方的同意，又在借读处签写了借阅便条后，我小心翼翼地吧回忆录的1至6部分带回了家……

为了如期归还，更急于在回忆录中寻找肖塞的足迹，回到家中，我开始了如饥似渴地阅读。在回忆录中我了解到，姚武越是四平第一高级中学最早期的教师之一，建校之初他就一直在学校任化学教员，后来又任教导干事等职务。他曾和肖塞校长共事六个月，对建校之初的情况有着充分了解。另外，从姚武越老师娟秀整齐的书写中，不难看出，姚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人，正因如此，他的回忆录就更真实可信。

在回忆录的第6页上，姚武越老师写到：“1949年2月，省政府任命原九中(怀德)校长肖塞(女)为四平中学第二任校长。教育厅任命苏捕为教导主任，学校安排教师鲁男、孙大康、姚武越、赵善治兼教导干事，协助教导主任处理日常工作。1949年8月，原辽北省与辽西省合并，学校又改名辽北省立四平中学。原校长肖塞调省教育厅工作，省政

府任命王子刚为学校第三任校长。”——从这段记录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肖塞校长在四平工作了整整六个月，而这半年时间里，学校更名为辽北省立四平中学。肖塞校长带领全校师生，在经历炮火硝烟满目疮痍的校园里，开始重新建设，使一个最初的完整的完全中学呈现在人们眼前。

姚武越老师在回忆录的第18页上写道：“特别值得回忆的是，肖塞校长，她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和师生们共同劳动，我们身上有多少汗，她的身上也有多少汗。在劳动休息时，她还给大家讲，在延安时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，既亲切又受到鼓舞，劳动的劲头也就更足了。”在回忆录中，姚老师没有记录肖塞校长的身材长相，也没有详细介绍肖塞校长的成长经历，但通过大家在一起劳动的场面，让人了解到，肖塞校长不仅是来自延安的老革命战士，更是带来了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的延安精神，她身先士卒，与大家同甘共苦，并用革命斗志感染人教育人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回忆录中，姚武越老师还回忆道，在新中国建立前夕，四平虽然解放了，但因为几年的“四战四平”，国共交战也给学校师生带来很大的震动和影响，为了让师生都能安心上课，放心学习，“1949年5月，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，在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肖塞同志的领导下，由李志远同志具体负责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动党团登记活动。经动员以后，要求在师生中，凡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人员，在限期内坦白登记，划清界线，交代问题，争取得到宽大处理。”(回忆录24页)肖塞校长凭着自已丰富的革命经验，带领大家肃清了校园的反动因素，解除了师生心

底的不安，为学校迎来了风清气正的教学环境。

遗憾的是，在姚武越老师洋洋洒洒的数十万字的回忆录中，体现肖塞校长的字迹只有上面这三处。尽管我知道，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路上，四平第一中学有着太多太多事件需要载入史册，不可能停留在建校之初，但对于肖塞校长的追寻，依然意犹未尽。捧着姚武越老师的回忆录，我陷入沉思：肖塞校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性？她为什么成为四平第一高级中学的校长？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里，她又有那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呢？

可惜，姚武越老师已经退休并去世多年，如今的一中校园里最年长的也都是建国十年后出生的，没有人了解那段历史，更没有亲历者了。

带着种种遗憾，我打听到姚武越老师最后在四平第二中学退休，他有一个儿子叫姚振东，也是四平一所学校的老师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又平添一份希望，希望能在二中或者姚振东那里了解到姚武越与肖塞的点滴印记。遗憾的是，虽然我托朋友四处打听寻找，结果都是无功而返。

关于肖塞，哪里还会有七十年前的一些痕迹呢？我又来到了四平市图书馆，在四平市地方志资料馆里，我终于找到一本“四平市第一中学1948—1998年的《校友录》”在这本校友录的“在校工作过的校级领导干部名单”中，我发现第三个出现的就是“肖塞”的名字，虽然只有“肖塞：女，校长、书记，北京新街口外大街四号院4号楼”这一排小字，但这个发现让我欣喜，因为它给了姚武越老师的回忆录最真实的佐证。遗憾的是，这是一本“校友录”里，无论再往后面翻阅多少，再也没有肖塞的信息了…… (一)

红色印记

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高举旗帜的东大师生

三、组织“一二·九”学生示威游行

1935年12月9日，寒风凛冽，东北大学的师生视死如归，英勇地走在“一二·九”运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，成为主力和先锋，而这场著名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指挥，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、地下党支部书记宋黎。北平爆发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先是爱国请愿游行，后是向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游行大示威，第一次喊出了国民党严禁喊出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赤手空拳的爱国青年学生，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展开了殊死搏斗，大批学生被捕，千余名爱国学生受伤血染京城，震惊中外。

1935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制造了旨在侵犯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，而南京政府却一再退让，并准备在12月9日成立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，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。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。

12月8日晚，北平市学生救国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，决定组织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游行，成立党的秘密总指挥部，由西城区党委书记郑洪轩(梨树县人)任秘密总指挥，分多路统一行动。会议结束，郑洪轩回到学校，再次召开秘密会议，向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宋黎等传达会议决定，推选宋黎为东北大学总指挥。12月9日凌晨，东北大学300多名学生不顾校方阻挠，在学校大厅紧急集合，宋黎发表简短动员：“同学们，东北沦亡，我们无家可归，华北危机，国家危在旦夕，在亡国的命运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，我们怎能安心读书，当务之急是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日，这次游行请愿就是我们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。”

原定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、经西南门进入城内，与东北大学会合后，一同到市内请愿。因军警关闭西南门，导致无法进城。宋黎决定东北大学单独行动，队伍行至西新街口遭遇军警的封锁线阻拦，旋即转向北沟沿向西四大街行进。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，二三百名军警手持大刀、棍棒，杀气腾腾的拦住去路，学生们高喊爱国自由的口号冲了上去，军警挥起大刀，棍棒大打出手。搏斗中，王敬恒、刘淑清、侯淑艳等同学被军警打伤，宋黎大声呼喊：“同学们，冲过去，冲过去”。学生队伍一时被阻断，关山复同学掏出石灰包砸向军警脸上，警察眼睛被石灰包打瞎了，同学们趁机冲破封锁线，奔向新华门。此时，中国大学、北平大学、师范大学、民国大学、中山中学、市立女中等十所大中学校的学生，也都到达新华门，各校学生共2000多人。

新华门前人山人海，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反对华北五省自治！收复东北失地！武装保卫华北！打倒汉奸卖国贼！”新华门大门紧闭，前廊排列着持枪的武装军警，摩托车架着机枪杀气腾腾，当场学生们推举宋黎、董毓华等12人为请愿代表，面见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，递交请愿书。而何应钦早已躲起来，当局派参议侯成出面委婉应付。侯成支支吾吾不予正面答复。宋黎和各位代表见状向党的秘密总指挥部汇报，并提出意见，请秘密总指挥部、学联和请愿代表共同研究决定，改游行请愿为游行示威，宋黎被推为游行示威总指挥。

早期共产党员宋黎的传奇故事

单志 魏晓光 整理

往事如烟

特殊的礼物

康国臣 王殿海

公主岭市二十家子满族镇中心校已故退休教师、共产党员杜景山，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，但他生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不求索取的高尚品质和无私帮助贫困学生、救济贫困群众的诸多感人事迹却深深地印在广大师生和群众的心中，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。我们以亲身经历感同身受从杜老师生前耀眼的事迹中，采摘几朵鲜艳的花朵。

60斤高粱米

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我的哥哥康国臣在怀德县(现公主岭市)和平公社建设学校读初中。我家有8口人，父亲身患气管炎，每天坚持在生产队里劳动，但即使辛苦一整年也挣不回来全家的口粮，家庭生活极其贫困，勉强供我们哥仨念书。哥哥念初中不到一年就不念了，

一连好几天都没去上学。一天晚上，杜景山老师来到我家了解哥哥没去上学的原因。杜老师在我家住了一宿，耐心地劝说哥哥继续念书，还讲了朱德元帅少年时念不起书，是亲属出钱供他念书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故事。杜老师还问我父母有什么困难他可以帮忙。当杜老师得知我们家吃的全是玉米面而且还有断顿的时候，心里很不是滋味……在杜老师的劝说下，父母最后又同意哥哥上学了。杜老师家有5个孩子，老母亲已70多岁了，全家8口人靠他一个人每月30多元工资艰难地维持生活。一天晚上10点多钟，杜老师骑着自行车驮着60斤高粱米，从40公里外的二十家子公社到我们家已是满头大汗，他说这点儿高粱米送给我家接济生活，感动得我们一家人不知说什么好，父母一再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，用优异的成绩报答杜老师的恩情。

10元钱

下安大队黄美沟屯坐落在三面环山的山沟里，交通不便，屯里有4名学生在建设学校读初中。杜老师教语文又是班主任，经常下屯到学生家进行家访。有一年冬天，他来到学生家冯玉家，看见冯玉穿着露棉花的棉袄，腰扎麻绳。杜老师跟他唠起了家常，详细沟通了孩子的学习情况。临走时杜老师说：“我看你的棉袄坏了不能防寒，这有10元钱拿去做件棉袄穿吧。”冯玉说什么也不要。杜老师诚恳地说：“这10元钱是我给你的不用还。”说完杜老师将10元钱塞到他手里就走了。望着杜老师的背影，冯玉双眼噙着泪，一时不知说啥是好。

150元药钱

我们村农民马大根本不认识杜老师。有一年的秋天，马大去地里干活，路

上遇上杜老师徒步去学校上班。两人边走边唠嗑，当得知马大老伴身患坐骨神经痛没钱买药治疗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杜老师问马大治疗老伴的病用的是什么药，老马无意中就把药名告诉了杜老师。没过几天，杜老师去市里开会，他跑了好几个药店，终于花了150元买到了两盒药，送到马家。马大两口子又惊又喜，他感动地说：“这150元药钱我一时没钱还你”，杜老师诚恳地说：“谁家都有危难遭灾的时候，这两盒药我送给你了，治病要紧啊！”马大两口子感动得流下了感激的泪水。用完这两盒药，马大老伴就能下地干活了。马大逢人便说是杜老师救了老伴的命，这恩情他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(三)

本版编辑 赵艳红 魏静 本版校对 赵健杰
电子邮箱 sprzbkb@163.com

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

(1931年9月—1945年8月)

党史

1943年，李福一家三口从江东返回故乡，先落脚在磐石县大旺乡前倒木沟屯，后在伊通县地局子倒木沟定居，又被人告发。此时，因李福重病在身没法逃走，只好托他人通融，将开荒的一亩二亩地，连同没有收获的庄稼交给举报人，事情才得以平息。

1945年日本投降，李福夫妻结束了10年之久的担惊受怕的逃难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李福夫妻视烈士遗孤胜似亲生，三口之家相依为命，患难与共。他们把父情母爱，全部献给了革命者的后代。

1963年，为烈士遗孤含辛茹苦，操劳半生的李福夫妻双双病逝。1983年，伊通县政协帮助李殿春在黑龙江省五常县找到了他的生父，即当年的磐石游击队指导员李克隆。

47载父子重聚首，李克隆深深感激李福夫妻为他抚养了后代[中共伊通满族自治县党史办公室编著：《中国共产党伊通历史》第一卷，第65—69页]。

六、伊通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

伪新京(长春)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得到营城子伪军遭到袭击的消息，命令伊通警察署、营城子警察署限期破获，此时正是日伪政权残暴推行“集团部落”时期。由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，使日本殖民统治者认识到，光靠军事“讨伐”，不可能消灭抗日武装力量，军事“讨伐”只是一种“治标”的办法，同时必须采取一系列“治本”的政策和措施。强行“集团部落”，制造无人区，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推行“治本”政策中最

残暴毒辣的政策。“集团部落”政策，即日本殖民统治者指派军警用烧房、杀人等残暴手段，强迫分散居住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的各族民众，离开住地迁往由伪军警严密控制、实行法西斯统治的“集团部落”(即大村落)，而原住地则被划为禁止民众居住的“无人区”，以此来切断抗日武装与广大民众的血肉联系，断绝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，使其丧失存活的物质基础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这些无人区，严禁修筑房屋，绝对禁止居住；因耕种土地或其他劳作需要通过或进入“无人区”时，则必须向警察署申请并取得许可。另一方面，把被驱赶的民众集中到日伪指定的“集团部落”严加控制起来，在部落周围建有围墙，挖有水沟，或拉上铁丝网，部落四周设有

炮台或地堡，部落内驻有日军、伪军(自卫团)或伪警察。

12岁以上居民都要发居民证，外出居民还须持有警察机构签发的通行证和携带物品许可证，出入大门必须持证接受军警的盘查。部落居民出入耕种，限制在部落周围4公里之内，而且必须当日返回，不准携带超过个人食用的粮食、食品和食盐。有些部落还不准种植可直接食用的土豆、玉米和豆类作物，秋收时还要检查地亩和粮食。部落内实行保甲连坐制度，一人犯事，十家受株连。对违反规定者则以“通匪”论处，轻者遭毒打、监禁，重者处死。日伪当局通过上述办法，严格控制与监视民众的言行，防止民众为抗日武装提供物资、情报，严禁建立秘密反日群众团

体。由于划定无人区，使一些靠入山做木业、砍柴、采山菜、采药材、打猎谋生的民众失去了维持生活的条件，陷入了十分困苦的境地。进入“集团部落”的民众，就如同进入了法西斯集中营，丧失了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，部落居民白天不得远离部落，晚上还要受到警察特务的监视和威胁，夜间不准开门、点灯，

不准三五人在一起走路、谈话。警察特务们经常以检查户口等名义闯进民宅，欺压民众，奸污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居民们除受警察特务的迫害外，还要受到种种的奴役和剥削，生活十分困苦，衣食住行毫无保障，常常陷入饥寒交迫，疾病缠身的境地。

(未完待续)

